那些历史的『隐藏款』，改写我们的认知

不久前，著名历史学家、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暨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侯旭东在“人文清华”讲坛上发表演讲，带领听众在考古材料与简牍档案中穿行，寻找那些被宏大历史遮蔽的日常生活以及历史的多种可能性。

■侯旭东

我很荣幸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研究。什么是历史的“隐藏款”？哪些会被隐藏？我们又该如何发现它们？接下来请大家听我聊聊几个小故事。

汉景帝到底吃不吃老鼠

第一个故事，我们来讲汉代的一位皇帝——汉景帝。汉景帝与他的父亲汉文帝开创了汉初“文景之治”的稳定局面，为儿子汉武帝开疆拓土奠定了基础。不过，今天要讲的不是他的丰功伟绩，而是汉景帝和老鼠的故事。

在景帝的陵墓——阳陵里，埋藏着大量的随葬品。考古学家经几十年的探测研究发现，阳陵周边共有80多个外藏坑。其中，东侧的几个外藏坑里出土了不少动物骨骼，包括牛、羊、兔、犬、猫、狐狸、豹子等，比较特别的还有两块老鼠骨头，经鉴定为褐家鼠。

汉代人认为，人死后在地下仍需吃喝、穿衣、出行，所以，这些动物是作为随葬的食材放入的。其中有两块褐家鼠的骨头，难道老鼠也是当时的食物吗？今天的人不吃老鼠，2000多年前的汉景帝应该也不会吃老鼠。那么，老鼠是怎么到外藏坑中的呢？考古学家想到了一种可能：老鼠天生会打洞，很可能是老鼠钻进外藏坑后才死去的。因此，动物考古学家鉴定了阳陵外藏坑的动物骨骼后提出，除后期侵入的褐家鼠，其他动物都是作为皇帝膳食放入的。

对于这样的结论，我产生了疑问，因为我曾见过另一批墓葬出土的材料，它们来自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子窦绾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的墓。满城汉墓属于“崖墓”，采用以山为陵的营建方式，规模很大。墓中的耳室里放了很多陶罐，里面装着酒和各类动物骨骼。其中有3个陶容器里装着许多小骨头，考古学家鉴定后发现，那是岩松鼠、社鼠、褐家鼠等多种鼠科动物的骨骼。这些鼠可不是一两只，而是几十甚至上百只。而且，有的容器（如陶壶）有盖，所以这些鼠不可能是后期侵入的。由此可以推断，中山靖王刘胜和妻子窦绾生前吃老鼠，故下葬时将这些老鼠作为食材随葬。

那么，中山靖王吃老鼠，是否意味着汉景帝也吃老鼠呢？这种可能性很大。让我们再来看阳陵外藏坑的构造。考古学家提供的剖面图显示，老鼠要钻到外藏坑中，需穿过约3米厚的垫土层，还要咬穿十几厘米厚的两层棚木，这种概率是极低的。由此我们得出结论：这两块褐家鼠骨头代表的老鼠，不是后期钻入的，而是下葬时作为食材与其他动物一同放入阳陵外藏坑的。由此得知，汉景帝以及他的儿子、儿媳都吃老鼠，这是汉代人的一种饮食口味。这也算是一种历史的“隐藏款”。

之前很多人都赞同老鼠可能是钻进外藏坑的，是因为今人不吃老鼠，所以才有了这样的结论，考古学家最初也受此影响。为何会这样？因为我们的知识和经验有限，我们习惯用自身经验去推断2000多年前的古人，认为古人与我们今天一样。这种思维习惯就是“以今度古”。

通过汉景帝吃老鼠的故事，我们需要反思“以今度古”的思维习惯：唯有放弃成见，才能有所发现；意识到无知，才能获得新知。这就是第一个小故事的意义，它告诉我们，发现历史“隐藏款”的关键，是放下成见，认识到自身的局限。

汉晋简牍里的普通小吏

历史不只是大人物创造的，每一个普通人都在创造历史。正是这种历史观的转变，让我们能够发现更多历史的“隐藏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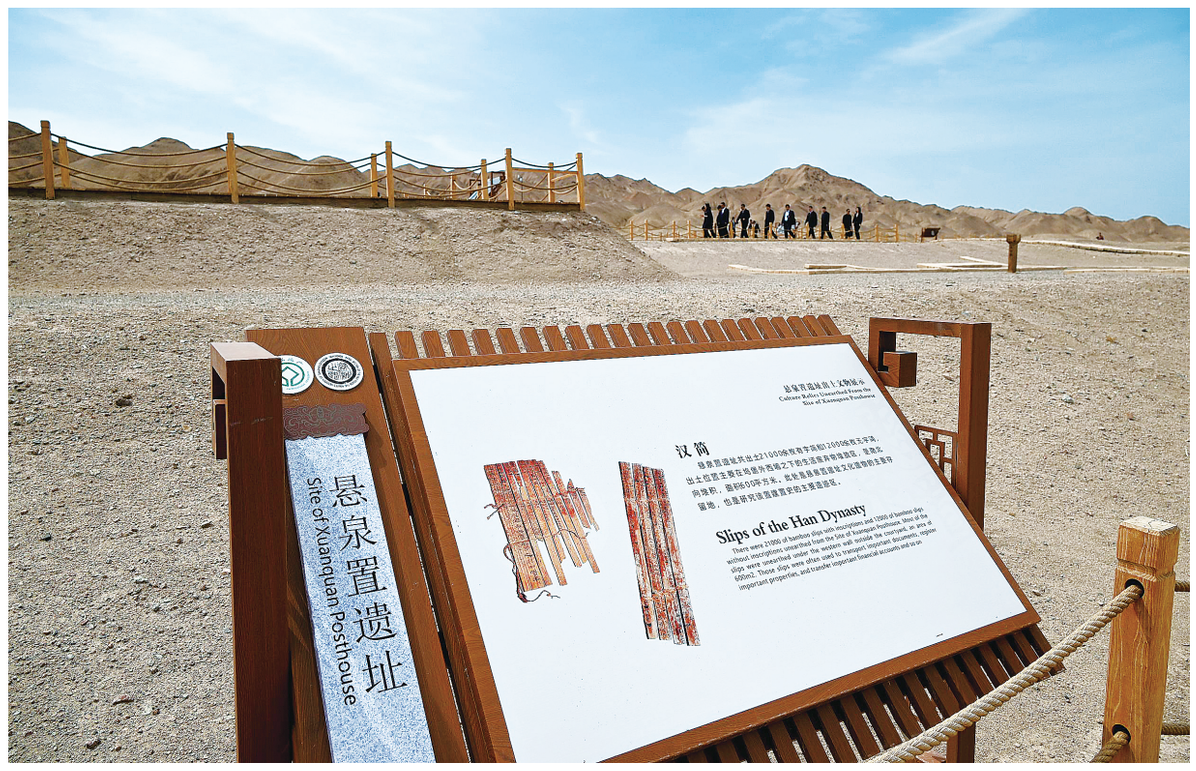
说到小人物、普通人的历史，到哪里去找他们的材料呢？对于我所研究的秦汉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来说，寻找普通人的材料需要借助20世纪以来的史料大发现，这些史料包括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遗书和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等。

我今天要讲的是汉晋简牍，从1901年开始，目前已出土了30余万枚简牍。从内容看，简牍里既有《诗经》《尚书》《论语》《道德经》等典籍，也有秦汉时期的大量律令和行政文书。墓葬中还有不少作为随葬品的简牍，这些简牍里活跃着很多历史中的小人物，我们可以通过阅读简牍打捞他们的痕迹，发现他们的生活碎片。

下面我给大家讲两位汉代的普通小吏。

第一位叫师饶，他的名字出自江苏东海县尹湾村一座汉墓出土的名谒。所谓名谒，就是2000多年前写在木简或竹简上的名片。师饶当时担任东海太守的功曹吏。东海郡位于今天山东南部和江苏北部，郡治在山东的郯城县。功曹吏主要负责人事管理，是郡一级的官员。

墓葬里有不少文书，其中《元延二年日记》非常有意思。日记写在竹简上，大概有六七十枚，竹简本身是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汉成帝时期）的日历，师饶在日历空白处记录了自己这一年的行踪，包括去了哪里、做了什么、住在哪里。他这一年共出差了80天，住的地方多是“传舍”和“亭”，住“传舍”的天数最多。原来，不光现在的职场人经常出差，2000多年前的小吏也是如此。



悬泉置遗址 视觉中国 供图

> 用历史映照当下、探索未来，会发现历史与历史学不只是束缚，更是一种解放；我们从中获得的也不只是知识，更是智慧与力量，它能让我们更好地创造未来。
>
> ——侯旭东

师饶的日记多数只记录了出差日期和住宿地点，只有9月26日这一天写了具体的事：“旦，逐贼，宿襄贲传舍。”这天他奉命去郯城县东北方向的襄贲县一带抓捕盗贼。当时，抓捕盗贼是地方官员的重要任务。按规定，如果盗贼出现3次以上没被抓到，地方官可能会被免职，所以他们都会全力以赴。师饶这次的任务应该很棘手，他在襄贲住了三四天才回到郡治。正是依靠许许多多像师饶这样的小吏维持治安，西汉王朝才得以长治久安。

日本学者曾根据《元延二年日记》的记载画过一张师饶到郡外出差的地图。这一年，他共外出6次，去过东北方向的琅琊国，也去过西南方向的楚国。他好几次出差到楚国的都城彭城，最长一次住了近20天。遗憾的是，日记里没有记录他具体做了什么，很可能是去完成郡守分配的秘密任务。按当时规定，郡守不能随便出郡，所以只能派亲信联络沟通，师饶就承担了这样重要的任务。这些都是我们从《元延二年日记》里发现的内容。

那么，在西汉，像师饶这样的小吏到底有多少？给大家看一组当时的数据：当时和东海郡一样的郡国有103个，县级单位有1587个，小吏总数超过11万。正是这些小吏支撑起了西汉王朝的巨轮，让它行稳致远，延续了200多年。

《鸡出入簿》里记录了什么

下面要讲的另一位小吏，工作在西汉王朝最西端的敦煌郡。悬泉置遗址位于今天敦煌市瓜敦公路甜水井南侧，是中国唯一一处经系统考古发掘的丝绸之路古代驿站遗址。这里共出土了3.5万枚汉简，记录了当时中西方交流沟通的珍贵信息。

下面我们来看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元康四年（公元前62年，汉宣帝时期）的简牍记录《鸡出入簿》。其中，“出鸡”记录的是消费吃鸡的情况，“入鸡”记录的是鸡的来源。

仔细分析其中的内容，我们发现了很多历史的“隐藏款”。首先，这份记录是谁做的？是一个叫“时”的人，他的职务是厨啬夫，相当于今天的行政总厨。那么，是哪些人消费了鸡呢？有丞相史、大司农卒史、太医、使者，这些人都来自长安。记录里最后注明的是“东”，意思是他们吃完鸡后要向东出发，也就是完成使命后返回长安。记录里还提到“往来再食”，说明有些人往返都会在这里消费。除了中央官吏，还有一些郡级或州级官吏也都是鸡的消费者。

鸡的来源有两类：一类是悬泉置购买的，另一类是各县提供的。记录里还提到了鸡的价钱：“一双鸡80钱”，也就是一只鸡40钱。

40钱一只的鸡贵不贵呢？我们可以做个对比：元康四年，一斛谷物值5钱。一只鸡40钱，相当于8斛谷物。汉代一斛谷物约等于今天的60斤，8斛就是480斤粮食。由此可见，当时鸡确实非常贵。所以，只有中央来的官员、郡级和州级官员才能享用鸡肉，普通官吏每顿饭只能享用三升米或三升粟，只有碳水，没有什么副食。

从西安到敦煌有1693公里，沿途都需要像悬泉置这类官方设置的传舍提供住宿、饮食。我曾经做过统计，在西汉王朝，这样的交通设施共有2057个，每个都承担着接待任务。除了《鸡出入簿》记录的鸡肉，往来人员的食宿、马匹、车辆等都需要记录。无数个像时一样的小吏，每天重复着接待、记录、统计的工作。这些机构的运转成本很高，单说西汉末年，全国每年要消费约15.2万只鸡。消耗的粮食更多，不仅供往来官吏食用，还要喂大量马匹，一年共消耗240万斛，相当于当时全国田租收入的2.9%，也相当于运到长安的漕粮的60%，这个数字非常庞大。

刚才讲了时和师饶的故事，在简牍里还能看到很多类似的人。这些都是历史的“隐藏款”，藏在冰山之下。没有历史观念的转变，没有新史料提供的可能，我们没办法听到历史深处的回响。好在今天的我们很幸运，有条件看到这些，听到这些被遗忘已久的声音。

中国农耕社会是如何形成的

刚才我们提到了汉景帝的餐桌、师饶的日记、时的报告，那些都是大人物或小人物的生活碎片。若看向宏大的历史，其背后有着更不易察觉的“隐藏款”。这种“隐藏款”关乎历史的可能性。

什么是历史的可能性？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在《可能性、现实性和历史构图》一文中提出：历史研究中的“历史事实”，只是“实现了的可能性”，还有更多未实现的可能。历史研究应从“历史现实性”“历史事实”往前一步，研究“历史的可能性”，如此，研究对象能大幅扩大。用他的话说，“可以增加一个数量级”。

以中国农耕社会为例。中国几千年的漫长历史，均为农耕社会。那么我们是何时进入农耕社会的呢？古人最早栽培稻距今约1万年，栽培粟距今约8000年。很多人可能认为，那时的中国已经进入农耕社会。虽然，我们发现了一些不同时期的稻田、麦田遗址，比如河南内黄县三杨庄遗址出土了汉代田垄遗迹与农民院落，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一篇论文还复原了汉代农舍，但是，当时这样发达的农耕区是否普遍呢？大家很容易将某个局部发现的现象推衍成古代社会的整体状态，而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收藏的秦代律令中提到“新黔首不勉田作，缮室屋”。“新黔首”指东方六国的百姓，说他们中不少人不努力种地，不愿修房子，流动性强。

再看汉代。虽然发现了汉代农田遗址，但据《汉书·地理志》记载，除关中、梁宋地区农业发达，很多地区是农耕不发达的。东汉学者班固还提到，天水、陇西地区“以射猎为先”，定襄、云中地区“好射猎”；颍川、南阳地区（今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的百姓“好商贾渔猎”，农耕同样不发达。这些表述提醒我们，西汉时，即便是北方地区，农耕社会尚未完全形成，更不用说当时农耕更加落后的江南了。

农耕社会是如何形成的？离不开众人的努力，而地方官的作用更是关键。渤海郡（今河北南部、山东北部）如今农耕发达，但西汉中期当地人并不重耕种，而是依赖渔盐，偏好经商。汉宣帝时期，渤海郡太守龚遂推行“劝课农桑”，要求百姓种田、种树、养鸡、养猪，督促务农，百姓不得不卖刀剑、买牛犊，从事牛耕。据史载，当地风俗很快得到了改变。

另一个例子是东汉末年的郑浑，他曾任下蔡县（今安徽省凤台县）、邵陵县（今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当时属颍川郡）县令。彼时，南阳、颍川地区的人仍不喜欢农耕，偏好渔猎。郑浑要求百姓种地、开垦稻田，还鼓励生育，才逐渐改变了面貌。

龚遂、郑浑只是众多地方官的代表。正是无数人的持续努力，约在7世纪初的唐朝初年，中国的农耕社会才最终形成。唐朝初年编写的《隋书·地理志》中描述各地风土时，多数州均提到百姓“务于农事”“尚稼穑”“重农桑”等。和《汉书·地理志》相比，农耕已成燎原之势，南方多地也变为农业发达区。可见，从战国到唐初，历经约千年时间，中国大部分地区才真正进入农耕状态。

由此可见，中国的农耕发展经多阶段缓慢推进，直到唐代才实现普及，过程中不乏波折。完整的历史图景是：不同时期多种生计方式并存，依靠国家力量、历朝“劝农”政策以及各级地方官的努力督促，加上自然环境的变化与百姓接受改造，中国主体地区最终进入农耕社会，部分地区仍保留渔猎、采集、经商等传统，延续至今。这说明中国农耕社会的形成并非单线、必然，而是充满了可能性。

从历史的可能性中发现人生的可能性

这种历史的可能性值得重视，因为其背后关乎认识的可能性。历史既指真实发生的人和事，也指对历史的记录与研究。若认识到历史的可能性，就能在过去中发现潜在的可能。

而且，历史与今日紧密相连。今天是明天的历史，我们今日努力创造，明日便成过往。个人的小历史终将汇聚成时代的大历史。从认识历史的可能性出发，就能发现人生的可能性，而人生的可能性就藏在日常生活中。

这里的日常，重点是“常”，指那些反反复复出现的活动，包括师饶、时等古人的日常，也包括我们每个人的朝九晚五。这种日常是低沉却持久、生生不息的力量，蕴含着无数可能，也是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的力量。只要我们做好每一天的日常，就能创造美好的未来。

汉景帝与老鼠的故事，提醒我们认识自身经验与知识的有限；师饶、时的例子，证明常人常事也值得纳入历史叙述；农耕社会形成的曲折与漫长，让我们看到历史的可能性。最终，从历史的可能性中，才能够发现我们自己人生的可能性。

用历史映照当下、探索未来，会发现历史与历史学不只是束缚，更是一种解放；我们从中获得的也不只是知识，更是智慧与力量，它能让我们更好地创造未来。

（演讲内容有删减）

睡虎地秦简《语书》 新华社 发

从“赛道”奔向“原野”

言语录

以下是作家、心理学家毕淑敏在第十七届新东方家庭教育论坛上的讲话摘录。

■毕淑敏

中国的教育基于“学而优则仕”，主要考核的是记忆力。为什么要考核记忆力？在《红楼梦》中，一遇到什么事，有人就会说：查查祖上是怎么做的。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就是一板一眼地沿袭传统，所以，重要的是遵循祖上的做法。读书人要做官，就必须熟记各类典籍，所以要考核的是记忆力。那么，现在这个时代，显然已经不需要那样的记忆力了，而是万分珍视一个人的创造力。

但是，今天我们的学校还在考记忆力，经常考哪一年发生了什么事。别说孩子们不愿意记，我们也已经习惯了遇到任何一个问题都去问AI，这样简便、快捷又准确。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面临巨大变革的时代，教育到了应该放弃单纯考核记忆力的时候了。

其实，没有哪一个小孩子是拒绝学习的。你见过一个不愿意学说话的小孩吗？你见过一个不愿意走路或者摔到地上拒绝爬起来的孩子吗？从来没有。一个正常的孩子，他天生就是有求知欲的。我觉得，强调“记忆优先”的这种教育，实际上是把很多记忆力不够突出的孩子排斥在优秀学生的范围之外，但是你要知道，人除了记忆力以外，还有很多种能力。

随着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不甚清晰的未来。也许，将来大量的工作都会被机器人和AI所取代，我们的孩子将何去何从？我以为，无论世事如何变幻，他们仍然要幸福快乐地去度过他们的人生，他们依然要有价值感、有尊严感。教育从现在开始，就要为他们找出大致的方向。

我的答案是：人生不是“赛道”，而是具有多种可能性的“原野”。不变的教育之道就是爱我们的孩子，鼓励他们，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可能性，让他们的能力得以发展，就像李白所说的“天生我材必有用”。我们要相信每一个孩子身上都有一种或多种才能，我们要去爱惜、去发掘，去给他们和谐微风，而不是暴风骤雨，给他们无谓的打击。

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作“重要他人”，说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有一些重要人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据统计，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重要他人”就是老师和亲人，其中老师的比例还大过我们的亲人。所以，教育就是这样潜移默化，就是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塑造着每一个人的心灵。

我举一个小例子。孩子刚生下来，大家都特别在意他的长相到底像谁。随着孩子慢慢长大，很多家长经常会对孩子这样说：“哎呀，你怎么不挑我们的优点长呢？”“你妈妈长得那么好看，你怎么就不好看呢？”事实上，孩子的长相不是任何一个家长造成的，只是一个概率问题。孩子虽然很小，可能只有一两岁，可是你要知道，孩子会深深地记住你说过的那些话，他可能从此对自己的长相感到自卑。

作为心理学家，我发现很多人都因为自己的长相而自卑。我曾经在一次讲座中做过一个小测验，我对台下的听众说：如果你为自己的长相自卑，请举起你的手。结果，90%以上的人都举起了手。我当时看到台下有一个女孩挺好看的，可是她也举了手。讲座结束后，我忍不住拉住那个女生，问她：“你能悄悄告诉我，你为你长相的哪一点而自卑吗？”那个女孩告诉我：“我的第六颗牙长得不好，所以我从来不笑。”我第一次知道，自卑不是因为真的有什么缺陷，而是一种心理上的卑微。

我做过很多心理咨询，无数次提示大家不要自卑。因为一自卑，你就对自己的判断力下降了，而且对世界的判断力也会变得不准确。究其原因，自卑最早经常来源于父母的评判，比如长相、个头的比较，更别说上了学，家长会拿孩子的学习成绩和别人家的孩子进行比较。父母的一个无心之举也许会给孩子带来终身遗憾。

所以我认为，家长一定要多鼓励孩子，让孩子知道自己是有价值的，他就会有配得感。“配得感”的意思是一个人对自己的价值和能力有着清晰的认知和自信，相信自己配得到更好的。家庭教育中经常有一个误区，我们常用表扬代替鼓励。其实二者是有区别的。表扬，我们看到的往往是结果；鼓励，我们看到的是过程。孩子不一定最后会有优异的结果，但我们应该去鼓励他努力的过程，这样他就会有一种配得感。

孩子们不需要大人给他们标准答案，他们有自己的原野要去奔跑，我们只需多给他们鼓励、爱和空间，他们就会更好地生长。希望孩子们都能够从“赛道”真正奔向“原野”。